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张伯驹与故宫国宝

张伯驹一生钟情于文物收藏,在曾经那个动荡不安、国宝屡遭盗劫的年代,他凭借深厚的学识、雄厚的财力以及满腔热忱,费尽心血守护文物国宝。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捐献了诸多书画珍品,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,更为中华民族留存下璀璨的文化瑰宝。



张伯驹

《伯远帖》:东晋风流 宛然在眼

王珣是东晋名门王导之孙,书圣王羲之族侄,亦是书法名家。著名的《伯远帖》是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问候书信,信中写道:

珣顿首顿首,伯远胜业情期,群从之宝。自以羸患,志在优游。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。分别如昨,永为畴古。远隔岭峤,不相瞻临。

信大意是说,伯远你卓越的成就和情谊,是家族中的瑰宝。我身体羸弱多病,志向在于悠游自在。分别就像昨天,但都已成为过去。我们如今却远隔千山万水,无法相见。

魏晋时期的高士多崇尚清净避世、寄情山水,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,亦能充分感受到王珣的淡泊与洒脱。《伯远帖》笔墨俊丽秀雅,结体瘦硬开张,笔法飘逸疏朗,完美展现出晋人"尚韵"的审美追求。明代书家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这么评价《伯远帖》:"潇洒古淡,东晋风流,宛然在眼。"

《伯远帖》北宋时曾入宋徽宗宣和内府,后流落民间,入明为董其昌所有,清代则经大收藏家安岐珍藏。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《伯远帖》进入清宫,深得乾隆皇帝喜爱,特意将其与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一同珍藏于养心殿的"三希堂",并称为"三希"。经历代专家考证,如今已确认《快雪时晴帖》和《中秋帖》均为后世摹本,而王珣《伯远帖》则为真迹。作为王氏家族法书现存的唯一传世真迹,王珣《伯远帖》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与艺术价值。

张伯驹求购《上阳台帖》与《伯远帖》始末

天宝三年,公元744年,被唐玄宗"赐金还山"的诗仙李白,邀请诗圣杜甫和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,自洛阳一路顺黄河东游。当行至河南济源时,李白特意登上阳台宫,去探望恩师司马承祯道长,不料道长已然羽化升仙。面对道长留下的亲笔山水壁画,李白有感而发写下《上阳台帖》,以寄托对恩师的思念之情:山高水长,物象千万。非有老笔,清壮可穷。——十八日,上阳台书,太白。

《上阳台帖》为李白自书四言诗,全文仅二十五字,此帖是现存唯一的李白法书墨宝,启功先生称此帖"字迹磊落",梳理"它的流传经过,是历历可考的",因此赞誉其为"肉迹"(亲笔墨迹),称见其字犹如见到李白本人。

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以及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,都曾经珍藏在伯驹先生的丛碧山房,三件国宝得以入藏故宫,也都与张伯驹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这段渊源,还要从民国时期的一位收藏家郭葆昌说起。

郭葆昌早年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,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麾下当差,被任命为"陶务总监督",受命前往景德镇烧制"洪宪御瓷"。郭葆昌烧制出了三四万件"御瓷",这些"御瓷"品质毫不逊色于历代皇家"官窑"。复辟闹剧很快就草草收场,"洪宪御瓷"中的大量精品,落入郭葆昌囊中,让他发了一笔横财。

1937年春天,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了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和《上阳台帖》,还有明唐伯虎的《孟蜀宫妓图》、清王时敏《山水图》和蒋廷锡《御园瑞蔬图》六件珍贵书画。张伯驹在《三希堂晋帖》一文中,有如下记述:

郭(葆昌)有伊秉绶《三圣草堂额》,颇以自豪。但其旨在图利,非为收藏。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,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。

张伯驹害怕国宝外流,有意收藏,因此就请琉璃厂惠古斋的老板柳春农居间,郭葆昌开价二十万大洋,张伯驹先支付六万大洋作定金,将画取走,约定一年内付清余款。

1937年夏,七七事变爆发,日本全面侵华,北平遭到金融封锁,张伯驹被困于此,上海盐业银行的汇款无法汇来。加之此前他购买西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花费巨款,无奈之下,第二年张伯驹只好将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退还给郭葆昌。如此一来,余下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、唐伯虎《孟蜀宫妓图》、王时敏《山水图》和蒋廷锡《御园瑞蔬图》四件画作,则抵付已支付的六万大洋定金,归张伯驹所有。

抗战胜利后,张伯驹先生对这两件墨宝依旧念念不忘,彼时,郭葆昌已于1942年去世,其子郭昭俊继承了收藏。张伯驹托人向郭昭俊求购二帖,郭昭俊开价高达1000两黄金,张伯驹只能望帖兴叹。

1949年,郭昭俊把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带到台湾,后又将两件墨宝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。张伯驹得知后,赶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,建议由国家出面收回。1951年,经周恩来总理特批,国家文物局终以35万港元购回这两件墨宝,并划拨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。1953年,张伯驹先生出于对毛主席的敬爱,通过中央统战部将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慷慨相赠,毛主席亦回赠谢酬,并于1958年把《上阳台帖》转赠给故宫博物院珍藏。

《诸上座帖》

现藏于故宫的《诸上座帖》亦为张伯驹捐赠,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经典之作。这幅作品是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精心录写而成,内容源自五代金陵僧人法眼宗文益禅师的《语录》,不仅展现出其精湛的书法艺术,还承载着特定的文人交游与禅宗思想传播的意义。

《诸上座帖》师法怀素狂草体,曾一度被命名为《摹怀素书》,该帖成书于黄庭坚晚年书艺最为成熟时期,笔意纵横,气势苍茫雄浑,字法奇宕高古,尽显黄庭坚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,被誉为黄庭坚传世法书的代表之作。《诸上座帖》传承有序,最初藏于南宋高宗内府,后归权相贾似道;明代辗转递藏于李应祯、华夏、周亮工处,清初为孙承泽所珍藏,乾隆时期收入内府。

1924年,溥仪被逐出清宫时,将《诸上座帖》偷盗出宫。溥仪为维持奢华生活,让近身大臣陈宝琛办理故宫旧藏书画抵押事宜,后因无力归还全部款项,部分押品作价抵账,张伯驹遂以一万五千元的价格将米友仁《姚山秋霁图》和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收为私有。

荣宏军

来源:《北京晚报》

古代的"学位服"为何是青色?

"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"这流传千年的诗句,不仅是对贤才的思慕,也勾勒出中国古代学子服饰的一抹清雅身影。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中,学子们其实一直拥有属于自己身份的"学位服",那便是"青衿"。

为何偏偏是"青色"?在传统五行观念中,五色与五行相配,青色对应东方与木行,象征草木初生、万物萌发。《说文解字》释"青"为"从物生时色",恰与"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"的教育理念相呼应。身着青衿的学子,被视为未来的"宰相根苗"与"国家栋梁",青色承载的,是师长家国的期许与栽培之意。

那么,这种"青衿"究竟是何形制?这便需追溯至先秦至两汉时期的"深衣"传统。早期纺织技术有限,布幅较窄,为制作长衣,古人将上衣与下裳相连,形成"被体深邃"的深衣制,兼具礼仪与实用。"裾"指衣袍下摆,下摆平直者为"直裾",弯曲盘绕者为"曲裾"。

深衣所蕴含的典雅庄重,对中国文人审美影响深远,成为儒家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后世历代儒者,如宋之朱熹、明之先贤,皆致力于复原与传承深衣之制。朱熹所复原的"朱子深衣",采用"对穿交领"结构,平铺时为对襟,穿着时交叠成领,形制古朴庄重。明代则在承袭古意的基础上发展出"续衽交领",平铺亦呈交领形态,更显方正严谨。

此外,为简化制作,明代还衍生出通裁结构的"道服",虽制作工序不同,其礼仪地位与深衣相类。

在明代,深衣与道服并非日常随意穿着的服饰,其礼仪层级极高,常出现于极为郑重的场合——例如科举放榜之日。

在"学而优则仕"的传统社会,科举放榜实为学子生涯中至关重要的"毕业典礼"。在此人生关键时刻,深衣与道服便充当了他们的"毕业礼服"。

至明代,进士服饰更趋专门化,形成独特的"进士冠服":身着蓝色罗袍(可视为襕衫的升级),头戴饰有展脚、可加簪花的"进士巾"。这一身装扮,既显庄重,又添儒雅风流,成为科举功名的视觉象征。

张梦玥

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